

政治关联能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吗

——来自中国化工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张川¹ 娄祝坤² 詹丹碧³

(1、2、3. 上海海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01306)

摘要：本文利用我国化工行业上市公司 2008-2009 年的经验数据，研究了政治关联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在关系。本文从公司实际控制人和高管两个角度对政治关联进行界定，并且将高管的政治关联进一步细分为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和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两种类型。研究表明，实际控制人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其社会责任水平高于非政治关联企业；代表委员类的高管政治关联能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其政治关联的级别越高，所在企业的社会责任水平也越高，而政府官员类的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社会责任水平没有显著影响。此外，我们的研究还从侧面说明高管成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积极地参政议政有助于企业提高社会责任水平。

关键词：政治关联；实际控制人政治关联；高管政治关联；企业社会责任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当今世界企业发展的重要时代潮流，是市场评判企业优劣的重要标准之一。从 20 世纪初期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简称CSR）的概念产生，到现在已有近百年的时间。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企业社会责任运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呈现出全社会参与、全面加速的特征。特别是在经历了 5·12 地震、三鹿奶粉事件、国际金融危机和“紫金矿业”等重大事件后，越来越多的利益相关方开始要求企业以实际行动回馈社会，履行应尽的社会责任。事实表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社会进步、对企业长远发展具有十分的重要意义。近年来，一些具有前瞻性的高层管理人员已经开始树立起企业社会责任观念，自觉将社会责任纳入经营战略，完善经营模式，追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在以往的研究中，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因素可以分成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两类。其中，内部因素包括公司特征、利益相关者压力（Carall, 1994；郭红玲，2006）等，有关公司特征的文献主要集中在企业规模（Lepoutre, Heene, 2006；杨春方，2009）、经营业绩

(Leonardo 等, 2008) 以及行业归属 (李正, 2006) 等变量上, 外部因素主要是法制环境 (Rob Gray, 1995)、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Jason Zezheng Xiao, 2005) 和政府监管 (杜兰英, 杨春方 2007) 等几个方面。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背景下, 法律对市场主体经济行为的规制还没有到完善的地步, 因而政府被视为企业发展所必须的重要资源, 对于企业的生存、发展与竞争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张建君、张志学 (2005) 研究发现, 面对不确定的企业外部经营环境, 中国的企业会投入一定的资源处理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把政治战略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由此看来, 政府对企业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那么, 什么样的企业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 维护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能否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呢? 本文通过对我国化工行业上市公司的分析研究, 就这些问题找到了实证依据。

本文从实际控制人和高管两个层面对政治关联进行界定, 将实际控制人具有政府背景或者高管 (董事长和总经理) 曾在政府机构 (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 任职或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企业界定为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本项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 (1) 目前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文献, 涉及政治关联的较少, 本文从公司实际控制人和高管两个角度, 更全面地研究了政治关联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在关系, 为有关 CSR 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2) 在实证检验高管政治关联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的过程中, 本文采用联立方程模型控制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从而解决了内生性问题对研究结论的影响。(3) 本文对高管政治关联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在机理进行了分析, 从侧面说明了高管成为代表委员, 积极参政议政有助于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水平。

文章其余部分的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进行文献回顾, 并提出研究假设, 第三部分对变量进行界定, 说明样本选择以及数据来源, 第四部分是分析结果与讨论, 第五部分是结论。

二、文献回顾与假设推演

政治关联(Political Connection)是指公司与拥有政治权力的个人之间形成的隐性政治关系。政治关联现象在全球各个国家都广泛存在, 特别是在产权保护较弱的国家和地区更为明显 (Roberts, 1990; Faccio, 2005)。目前有关政治关联对企业影响的研究认为有正反两种效应。一些研究表明, 高管的政治关联是一种有价值的资源, 能够给企业带来诸如融资便利、税收优惠、政府补贴以及市场影响力方面的好处, 从而增加企业的价值 (Fisman, 2001; Johnson and Mitton, 2003; Chen et al., 2005等); 然而, 相反的研究却发现, 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可能因政治寻租活动而付出明显额外的成本, 并且政府官员也可能会利用这种关系来谋取私人收益(Faccio, 2006)。

一般而言, 在国外公司通过选举捐款等形式形成与政府官员或者国会议员的利益关系。而在我国的环境下, 企业可以从公司和高管两个层面建立起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从公司层面来说, 企业通过让政府参股 (控股) 的方式形成政治关联; 从高管层面看, 政治关联的途径主要包括政府官员 “下海经商”、自主创办企业, 以及企业主动邀请已退休的政府官员担任

企业高管，希望这些官员能够“发挥余热”两种（吴文峰、吴冲锋、刘晓薇，2008）；此外，白重恩、路江涌和陶志刚（2005）指出，私营企业可以通过直接谋求企业高层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处理好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一）实际控制人政治关联与企业社会责任水平

在我国，由于大部分上市公司由国企转制而来，因而多数上市公司与政府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血缘”关系。乔木、杜军（2009）在中国国有经济发展论坛上指出，国有经济角色对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巨大影响，其中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尤为重要是国有经济的政治角色。企业可以通过政府参股（甚至控股）的方式实现自身利益与政府利益在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建立起相对稳定和紧密的政治关联。在很多情况下，民营企业努力使政府、官员及国有企业拥有一定的股权，使民营企业带上一个“红帽子”，从而获得政府资源，促进了企业价值的提升（张祥建、郭岚，2010）。通常，上市公司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较合理的治理结构，拥有较多的利益相关者，是政府和社会关注的重点。而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主体，承担着特殊的社会功能，如稳定市场、提供就业、保护环境等，是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我们预期具有政府背景的上市公司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要好于其他非政府背景的上市公司。根据以上论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实际控制人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其社会责任水平高于非政治关联企业。

（二）高管政治关联与企业社会责任水平

杜兴强等（2009）把高管政治关联进一步细分为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和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两种类型。本文沿用这种分法，文中所界定的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是指公司高管担任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是指高管曾经在政府机构（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任职，但现在已经不再担任相关职务。如前文所述，政治关联是世界各国的一种普遍现象，特别是在产权保护较弱的国家和地区，政治关联作为一种替代性的非正式机制，能够缓解落后的制度对企业发展造成的阻碍，帮助企业获得融资便利、税收优惠、政府补贴等诸多好处。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政治环境作为一种极其重要的外部环境，对我国企业具有重要影响。民营企业建立政治关联有助于规避政府管制、保护自身利益，并从政府手中获得更多资源，从而有助于改善企业绩效（邓建平、曾勇，2009），因此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管都具有强烈的动机去获取政治关联，如当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等。

按照逻辑推理，当公司高管成功建立起这种政治关联后，会通过内、外因的作用共同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水平，一方面代表委员类高管通过参政议政，其自身的觉悟和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得以提升。另一方面由于近年来“两会”受到公众与媒体的普遍关注，身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高管的“社会关注度”也随之增加，并且高管政治关联的级别越高，其所受到的关注也越多。这种来自公众关注的压力会迫使高管所在企业更加积极地履行社会责任，以

满足社会大众的道德诉求。而企业经济效益的改善和社会责任水平的提高反过来也使得公司高管成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概率大大增加。但是，相对于高管的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而言，如果公司高管曾经在政府机构任职，但现在已经不再担任相关职务，那么他们的社会关注度相对较小，自然也不会像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类高管那样具有强烈的动机和激励去塑造良好的公司形象或提高公司的竞争优势。杜兴强（2009）的研究也发现，高管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不会显著影响公司业绩，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内生性。综上所述，我们提出假设 2a 和 2b。

假设 2a：公司高管的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能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并且政治关联的级别越高，其所在企业的社会责任水平也越高。

假设 2b：公司高管的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对企业社会责任水平没有显著影响。

三、变量界定与数据来源

（一）变量的界定

1、企业社会责任变量的设计与衡量

目前，学术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还没有形成一致意见。比较流行的观点有：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1971年提出的三个同心圆模型和Carroll（1979）提出的四层次模型，前者认为CSR内容如同三个同心圆，内圈责任是最基本的企业责任，即有效执行经济职能，中圈责任是配合社会价值的变化而执行经济职能的责任，外圈责任是积极改善社会环境的其他无形责任。而Carroll将企业社会责任划分为四个层次，即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尽管这两个模型都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作出了界定，并且在以后的研究中获得了广泛的认可，但两者都存在着不能全面、清晰的衡量CSR的缺点，直到后来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引入，许多学者考虑企业对利益相关者群体承担CSR的情况来衡量企业社会责任水平，才使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本文在翻阅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将CSR的衡量分为单一指标、多指标和综合指数衡量三种方法，具体见表1。

表 1 企业社会责任的衡量方法

类别	指标	文献
单一指标衡量	如企业慈善捐赠	钟宏武(2007),杜兴强(2010), 贾明和张喆(2010),王端旭(2011)

多指标衡量	如企业公众形象、名声、长期获利能力以及企业社会责任承诺等	Moore(2001)
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综合指数衡量	企业社会责任综合指数	Modic(1988),Carroll(2004),Haniffa & Cooke(2005), 李 正 (2006), 沈 洪 涛 (2007),Dima Jamali(2008)

上述三类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衡量方法中，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综合指数衡量多采用企业社会责任综合指数（沈洪涛，2007；李正和向锐，2007；Haniffa 和 Cooke，2005 等）。该方法的主要过程如下：先把公司所披露的社会责任相关信息划分为几个大类；然后，在将这些大的类别进一步分解为较小的类别并对各个小类进行定性描述或定量描述的赋值；最后，汇总所有小类的得分，这样得到的分值就是该公司披露 CSR 信息的总得分。本文同样使用这种方法计量企业社会责任水平，首先将企业的社会责任分为环境、员工、消费者、社区、一般社会、其他六个小类，再根据企业年报的内容对每一个小类分别赋分，最终将分值加总得到 CSR 的信息指数。

2、政治关联变量的设计与衡量

本文从公司实际控制人和公司高管两个角度，分别研究政治关联与企业社会责任水平之间的内在关系。对于公司实际控制人政治关联（CPC），如果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企业，并且该实际控制人是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或政府机构（如人民政府、财政局）的，则将其视为有很强的政府背景，将 CPC 值赋为 1；如果最终实际控制人为个人，并且该个人具有政治关联，则也将其 CPC 值赋为 1；否则，将其他的实际控制人 CPC 值赋为 0。

对公司高管政治关联的衡量，各学者在研究中采用的方法不尽相同，表 2 比较系统的总结了高管政治关联的衡量方法以及研究所使用的变量类型。

表 2 高管政治关联的衡量方法

文献	方法			变量类型					
	虚拟变量	比例	赋值	政治关联	董事长政治关联	总经理政治关联	政治关联级别	中央政府政治关联	地方政府政治关联
Faccio(2006)	√			√					
Fan等(2007)	√				√				
吴文峰等(2008)	√			√				√	√
余明桂等(2008)	√			√	√	√			
罗党论等(2009)	√	√		√					
邓建平等(2009)	√	√	√	√			√		
杜兴强等(2010)	√		√	√			√		

贾明等(2010)	√		√	√			√	√	√
Chaney等(2011)	√			√					
Wenfeng Wu 等 (2011)	√			√	√	√			

我们发现，虚拟变量法已经普遍应用于研究企业的政治关联问题，并且近些年来一些学者在使用虚拟变量的同时，对高管政治关联的级别进行赋值（邓建平等，2009；杜兴强等，2010；贾明等，2010），更好地反映出了中国的制度背景。而且，在变量设计上，许多学者已经对董事长、总经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等不同角度的政治关联情况进行了研究。本文参考已有的研究成果，将公司高管的政治关联进一步细分为两个部分：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DWPC）和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GPC）。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是指公司高管担任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笔者根据高管政治联系的强度赋值，按国家级、省部级、市级、县区级分别将 DWPC 值赋为 4、3、2、1，如果高管不具有政治关联，则将其 DWPC 值赋为 0。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是指公司高管曾经在政府机构（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任职，但现在已经不再担任相关职务。同样地，根据高管曾经担任职务的级别，按部级、厅级、处级、科级将 GPC 值赋为 4、3、2、1，如果高管没有从政经历，则将其 GPC 值赋为 0。

3、控制变量的设计与衡量

与以往的研究一样，本文选取公司规模与盈利能力作为控制变量。因为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水平与公司规模、盈利能力显著正相关（李正，2006；沈洪涛，2007 等）。通常公司的规模越大，盈利能力越强，其越有意愿与能力来承担社会责任。在本文中，公司规模用公司总资产的对数来衡量，而盈利能力用净资产收益率(ROE) 这个最常用的财务业绩指标来表示。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化工行业作为研究对象。首先，将研究样本固定与一个行业中，能够有效控制很多市场环境因素，极大地降低样本中的“噪音”，提高数据的可比性。其次，化工行业作为我国的支柱产业，正处于较快的发展壮大期，理应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最后，化工业不可避免地具有高污染、高危险等行业特征，这极大地提高了企业自身与利益相关者对其社会责任的关注程度。基于上述原因，我们认为选取化工行业作为研究对象可能会有助于得出较为明显的结论。

本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政治关联与 CSR 的联系，模型中采用的样本是 2008-2009 两个年度化工行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公司实际控制人和高管的政治关联，以及企业社会责任的数据通过手工采集而成，全部数据源自样本公司的年度财务报告和招股说明书等资料。行业分

类根据 Wind 金融数据库中申国万银的化工行业类，在剔除部分数据缺失的公司样本后，有效样本数为 232 个。

四、分析结果与讨论

1、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 3 给出了变量的基本描述性统计结果，包括均值、标准差、最大值和最小值。从表中可以看出，企业社会责任的平均值为 20.79，标准差为 4.405，说明不同企业的社会责任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对政治关联的情况，实际控制人具有政治关联的比例占到了 84%（包括实际控制人为个人，且该个人具有政治关联的情形），这反映了我国化工行业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大多数具有政府背景。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的均值为 1.56，标准差为 1.461，最大值为 4。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的均值为 0.38，标准差为 0.844，最大值为 3。可见，我国化工行业各上市公司高管政治关联的情况有所不同，政治关联的级别差异较大。

表 3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企业社会责任	20.79	4.405	34	11
实际控制人政治关联	0.84	0.371	1	0
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	1.56	1.461	4	0
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	0.38	0.844	3	0
企业规模	9.3123	0.40415	10.29	8.32
盈利能力	4.2006	17.58964	95.41	-64.10

2、样本组均值比较

为了直观地反映政治关联与企业社会责任水平之间的关系，我们从公司实际控制人和公司高管两个角度，对政治关联公司与非政治关联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均值进行了比较，同时对均值进行了 T 检验，见表 4。

表 4 样本组均值比较及 T 检验

政治关联类型		样本数	均值	均值差异	t	P 值	标准差	标准误差
实际控制人政治关联	有	194	21.23	2.648	3.133***	0.003	4.186	0.301

	系数	标准差	t	Prob.	F-Value	Adjusted R ²
b ₀	-15.422	5.847	-2.638	0.009	20.947***	0.257
b ₁	0.733***	0.176	4.167	0.000		
b ₂	3.692	0.634	5.822	0.000		
b ₃	0.041	0.014	2.827	0.005		
b ₄	1.043	0.500	2.086	0.038		

Equation: DWPC = c₀ + c₁ * CSR + c₂ * SIZE + c₃ * ROE + c₄ * YEAR + ε₃

	系数	标准差	t	Prob.	F-Value	Adjusted R ²
c ₀	-3.330	2.148	-1.550	0.123	7.818***	0.106
c ₁	0.097***	0.023	4.167	0.000		
c ₂	0.314	0.246	1.274	0.204		
c ₃	0.004	0.005	0.781	0.436		
C ₄	-0.129	0.183	-0.701	0.484		

注：*** 表示在 0.01 的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 0.05 的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 0.1 的水平上显著。

根据假设 2b，考虑到企业社会责任和高管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互作用，我们建立联立方程模型 3：

$$CSR = d_0 + d_1 * GPC + d_2 * SIZE + d_3 * ROE + d_4 * YEAR + \varepsilon_4 \quad \text{Model-3}$$

$$GPC = e_0 + e_1 * CSR + e_2 * SIZE + e_3 * ROE + e_4 * YEAR + \varepsilon_5$$

同样采用 SPSS16.0 对联立方程模型 3 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7：

表 7 模型 3 回归分析与 T 检验结果

Equation: CSR = d ₀ + d ₁ * GPC + d ₂ * SIZE + d ₃ * ROE + d ₄ * YEAR + ε ₄						
	系数	标准差	t	Prob.	F-Value	Adjusted R ²
d ₀	-19.371	5.970	-3.245	0.001	15.984***	0.206
d ₁	0.406	0.306	1.324	0.187		
d ₂	4.220	0.642	6.573	0.000		
d ₃	0.048	0.015	3.239	0.001		
d ₄	1.026	0.517	1.986	0.048		

Equation: GPC = e₀ + e₁ * CSR + e₂ * SIZE + e₃ * ROE + e₄ * YEAR + ε₅

	系数	标准差	t	Prob.	F-Value	Adjusted R ²
e ₀	0.719	1.318	0.546	0.586	0.557	-0.008
e ₁	0.019	0.014	1.324	0.187		
e ₂	-0.076	0.151	-0.500	0.617		
e ₃	-0.003	0.003	-0.940	0.348		
e ₄	-0.032	0.113	-0.286	0.775		

注：*** 表示在 0.01 的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 0.05 的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 0.1 的水平上显著。

从表 5、表 6 和表 7 可以看出，回归结果与我们的假设 1、2a、2b 完全一致。在模型 1 和模型 2 中，公司实际控制人政治关联的系数和高管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的系数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实际控制人政治关联和高管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对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存在显著、正向的影响，从而支持了假设 1 和假设 2a。模型 3 中，高管政府官员类政治关

联的系数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高管的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对企业社会责任水平没有显著影响,验证了假设 2b。回归结果同样显示,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其高管更有可能成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高管的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与企业社会责任是相互促进的。回归结果还表明,企业社会责任水平与公司规模、盈利能力在 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公司的规模越大、盈利能力越强,其社会责任水平也越高。而且,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和年度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上一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对下一年度的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五、结论

企业社会责任是经济全球化时代新的商业准则,是现代企业核心价值观和竞争力的重要体现。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决策与其他决策一样,必须进行理性的、审慎的抉择,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既要考虑企业自身的资源和能力,又要考虑诸如竞争者、市场、政府等外部因素,从而达到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回报(黎友焕等, 2010)。本文利用我国化工行业上市公司 2008-2009 年的经验数据,研究了政治关联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在关系。我们从公司实际控制人和高管两个层面对政治关联进行界定,并且将高管的政治关联进一步细分为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和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两种类型。研究结果表明,实际控制人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其社会责任水平高于非政治关联企业。而且,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能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其政治关联的级别越高,那么所在企业的社会责任水平也越高。而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对企业社会责任水平没有显著影响。

本文的研究结果揭示了政治关联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相关关系,为当前我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提供了一个解释。对以往有关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动机与影响因素的研究而言,本项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起到了很好的补充作用。此外,我们的研究还从侧面说明高管成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积极地参政议政有助于企业提高社会责任水平。当然,本文的研究目的并非倡导企业通过政治关联的方式来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水平,而是希望有效引导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以促进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 [1] Lepoutre J., Heene A.. Investigating the Impact of Firm Size on Small Business Social Responsibility: A Critical Review [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06(67):257-273
- [2] Stelios C.Zyglidopoulos, Andreas P.Georgiadis, Craig E.Carroll, Donald S.Siegel. Does media attention driv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11
- [3] Jason Zezheng Xiao, Simon S. Gao, Yuk C.Q. Cheung, et al. The impact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corporate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 in Hong Kong and the

- U.K. *Advances in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2005, 18: 219-243.
- [4] Fisman, R. 2001. Estimating the Value of Political Connection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4): 1095-1102.
- [5] Fan, J. P. H., T. J. Wong, T. Zhang. 2007. Politically Connected CEOs,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Post-IPO Performance of China's Newly Partially Privatized Firm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84(2): 330-357.
- [6] Faccio, M., R. W. Masulis, J. J. McConnell. 2006.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Corporate Bailouts. *The Journal of Finance* 61(6): 2597-2635.
- [7] 杨春方. 2009.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实证研究[J]. *经济学家*. (1): 66-76.
- [8] 郭红玲. 2006. 基于消费者需求的企业社会责任供给与财务绩效的关联性研究[D]. 西南交通大学.
- [9] 张建君, 张志学. 2005. 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政治战略[J]. *管理世界*. (7): 94-105
- [10] 吴文峰, 吴冲锋, 刘晓薇. 2008. 中国民营上市公司高管的政府背景与公司价值[J]. *经济研究*. (7): 130-141.
- [11] 白重恩、路江涌和陶志刚. 2005. 中国私营企业银行贷款的经验研究[J]. *经济学(季刊)* (2): 605-622.
- [12] 乔木, 杜军. 2009. 国有经济角色定位下的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研究[C]. 2009 中国国有经济发展论坛——危机与变局中的国有经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78-84.
- [13] 余明桂, 潘红波. 2008. 政治关系、制度环境与民营企业银行贷款[J]. *管理世界*. (8): 9-21
- [14] 罗党论, 唐清泉. 2009. 政治关系、社会资本与政策资源获取: 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世界经济*. (7): 84-96.
- [15] 邓建平, 曾勇. 2009. 政治关联能改善民营企业的经营绩效吗[J]. *中国工业经济*. (2): 98-108
- [16] 贾明, 张喆. 2010. 高管的政治关联影响公司的慈善行为吗?[J]. *管理世界*. (4): 99-113.
- [17] 杜兴强, 郭剑花, 雷宇. 2009. 政治联系方式与民营上市公司业绩: “政府干预”抑或“关系”? [J]. *金融研究*. (11): 158-174
- [18] 杜兴强, 郭剑花, 雷宇. 2010. 政治联系方式与民营企业捐赠: 度量方法与经验证据[J]. *财贸研究*. (1): 89-99.
- [19] 李正. 2006.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 77-83
- [20] 李正, 向锐. 2007.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内容界定、计量方法和现状研究[J]. *会计研究*. (7): 3-11.
- [21] 张祥建, 郭岚. 2010. 政治关联的机理、渠道与策略: 基于中国民营企业的研究[J]. *财贸经济*. (9): 99-104.
- [22] 黎友焕. 2010. 企业社会责任实证研究[M].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Can Political Connection Improv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from the concrete data of the listed companies of the chemical industry in china

Zhang Chuan¹ Lou Zhu-kun² Zhan Dan-bi³

(1.2.3.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hanghai maritime 201306)

Abstract: Using the concrete data of the listed companies of the chemical industry from 2008 to 2009 in china,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connection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is article defines political connection from both two angles of the actual controller and top executives, and the political connection is classified as “members of People's Congress (PC) and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CPPCC)” connection and “government officials” connectio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companies that its actual controller with political connection is higher than those without political connection. Moreover, the “members of PC and CPPCC” connection can improve the level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higher degree of political connection, the well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t will lead; however, “government officials” connection has no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addition, our research also shows that, from the side, top executives who are to be members of the PC or CPPCC, and participate in the administration and discussion of state affairs actively help to enhanc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Keywords: political connection; the actual controlle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作者介绍:

1. 张川, (1970—), 女, 四川自贡市人, 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 获会计学博士学位; 2005 年 9 月至 2006 年 9 月, 英国诺森比亚大学纽卡斯尔商学院博士后研究。目前, 是上海海事大学会计学教授, 厦门大学 MPAcc 中心兼职教授, 中国政府审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研究方向: 业绩评价、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等

E-mail: zhch2005@hotmail.com ; 电话: 021-55381820、13501618346

通信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沈家弄路 900 弄 29 号 102 室 (邮编: 200135)

2. 娄祝坤, (1987—), 男, 浙江湖州人, 为上海海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企业社会责任、公司治理等

E-mail: louzhu-kun@163.com; 电话: 15021259713

通信地址: 上海海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邮编 201306)

3. 詹丹碧, (1987—), 女, 安徽合肥人, 为上海海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企业社会责任等

E-mail: jenny-zhan2003@hotmail.com; 电话: 15216771071

通信地址: 上海海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邮编 201306)

.